

# 看清這是甚麼樣的世界

## 金陵的寫字人 海上的讀書人



副刊專題一連三期的「華文創作生態面面觀」系列，已透過4位作家的寫作情態，呈現華文文學生態的不同面貌，而今期的最後一期，將藉一位作者與一位書評人的視角，更加豐富我們對華文創作的理解。

葉兆言是江蘇南京人，其創作風格有着傳統文人的詩情與含蓄。身為一個專業寫作者，寫了這麼多年後，他對中國文學現場的看待可有變化？1985年生的顧文豪則是一位性喜書卷、樂至沉酣的讀書人，但對於中國閱讀界卻十足投入，致力推動閱讀和評論風氣。從他們所讀、所寫、所評論、所體會的生存與創作狀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內地文化人最真切的思想情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 葉兆言

## 用文學思考人的問題

出身文學世家的葉兆言，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作至今，作品總字數已過400萬字。他在寫作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好的光陰，濃厚的民間情懷與文人氣質也始終伴着他，加之身處古城南京，金陵的水土蘊育了他文字裡豐厚的懷古底蘊，因而他身上有那種格外平靜隨和的氣質。對於江蘇創作者的整體生態，他看來十分滿意並認為：「這和江蘇地緣因素有很大關係。江蘇的經濟發展，在中國內地不但地位高，還因着歷史傳承的關係，而具有京滬等許多城市所沒有的平和寫意，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葉兆言的心境難脫這大環境的滋養浸潤。」

「相比我的前兩代父輩而言，中國過去百年中最適合文學發展的就是近些年。」他說：「我很幸運，我的父親和祖父（編按：葉兆言祖父是葉聖陶）只能拿出10%至20%精力去寫作，但我可以拿出95%。」葉兆言所經歷的，是中國作家整體生存狀況最好的三十年，沒有戰爭、動亂與政治運動，在六、七十年代思想成熟，在80年代動筆，所以他是知足的。「我熱愛寫，也能寫，這已經很好。」

### 所有的文學都要創新

至於身為文學創作者所面臨的現實矛盾？他認為這種假想出的矛盾並不存在，因為他的行當以小說為主，而寫小說對寫作者所提出的挑戰，並非來源於制度，而來源於創新的能力。「所有的文學都要創新，要繼承，要找出和前面不一樣的東西。」那麼有沒有哪些東西不能寫？在葉兆言看來，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反動、反模範的過程。他反而認為當代內地作家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已經百無禁忌。「柏林牆時代，東歐那麼多作家有清晰的方向，他們的讀者也有。可是有一天沒有那道牆了，作者卻迷失了。」對於中國作家而言，也是一樣，創造新的東西，找到新的視點，才是最大挑戰。不再是過去那個「出界」可以化為暢銷元素的年代，如今的大陸作者想踩邊線，卻發現根本沒有邊線。葉兆言強調他特指的是小說藝術，華文小說創作中的容忍度，遠遠大於影視等媒介。

「所以我有些懷念那個政治禁錮的年代」他笑道：「如今，假如你用文學去表達社會現實問題，會有些可笑。因為其他媒体早已一早參與進了紀實過程中去。」但文學不同，文學所發生的效力是潛移默化，而現實中又充實着太多可以傷害文學的活動，譬如商業化、譬如用噱頭包裝等。影響作家保持個人良好心境的誘因也很多，生計、戀愛，太多了，雖然文學很脆弱，但葉兆言的心卻很樂觀，他的相信，一如福克納的態度——真正好的文學，是傷害不了也擋不住的。換言之，能被現實傷害的，並非真正的文學。

### 今天已非閱讀時代

當代文學的好與壞、成與敗，不該由身在其中的當事人去判定，但如一定要抱以客觀立場的去審視大陸作家生態，葉兆言認為整體而言，有着十足可觀。「語言能力就有着進步。」他說如果將1949年前的內地一線作家作品與當今的一線作品做個對照，便很明顯。「因為如今是有着很多人努力。文學需要的，是群體」。無論是西方的莎士比亞時代，還是東方的唐詩宋詞創作高峰，文學都是靠一大批懂的人協力推進的。

不過，仍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今天已非閱讀時代。」他指出：「文學已相當邊緣化，閱讀只有更邊緣化。」當下的時代是一個話題時代，人們所關注所熱衷的，不是閱讀，而是話題。「很多人不是看了一個作品之後去評價它，而是聽了對這個作品的議論之後，進行評價。」閱讀本身不再重要，在葉兆言看來，其實並無不妥。「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他的態度極為理智——世界上有那麼多美好的事情，不閱讀一樣可以生活得很幸福。但作為一個閱讀與寫作者，他個人認為「不能享受閱讀是可惜的，你不享受，那你不吃虧。」這件事和高雅、見識、博學並無關係。「也不必用標籤嚇唬人，沒有甚麼是必須要讀的。」他認為媒體整日推廣讀書風氣，其實未必那麼必要，「這不是我作為創作者的困境，沒有人要讀書，絲毫不影響我寫作。」在他而言，讀是人生的一大快樂，寫是一種巨大的享受。

就像唐詩，詩人寫詩，是源於想寫的動力，而不是為着出名——當時連讀詩的人都不多，按葉兆言的話說：「不過是小圈子裡傳閱一番。」但我們卻能想見李白等人可以從中獲取到的樂趣與得意。葉兆言坦言，人生中有太多無聊之事，就比如你在機場而飛機誤點，假若手上正好有本可以帶來閱讀快樂的書，便是至好的事。

### 文學沒有「人」便無前途

「每個時代對文學的要求不同」，正如那句人們朗朗上口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其實放大的歷史序列中，便能還原出宋朝時河南人前往蘇杭躲避戰亂的當時語境，它是文學表述，但對於民族史而言，卻是充滿痛苦的戰爭年代才應運而生的句子。文學的思考從來關乎於人，談的亦是人的問題。葉兆言認為，文學的功用不是告知以人「紅燈停綠燈行」這樣的事實，它的思考角度是獨特的，完全不同於有些人所想像的諸如文學作品反貪污腐敗。

沒有「人」的文學，在葉兆言看來毫無前途。他說自己是個既悲觀又樂觀的人，畢竟那麼多人在從事這個志業，因為它的美好。而他的思考又始終立足於人，正如他眼中巴金最好的作品不是以反封建為主題的《家》，而是控訴人類深層困境的《海雁》。因為《海雁》中那種妻子與母親對同一個男人之愛的不兼容與相互傷害，不是消除封建制度就能解決的人性問題。「文學必須往裡走。」他說：要走得更深更遠，一層一層抽絲剝繭。」正因為他懂得從人出發，才會對許多看似合理的「進步」現象打個問號。「就像自由婚姻是不是真的完全比包辦婚姻好？從人的角度出發，有時候，不一定。」

看似蜻蜓點水的一個例子，卻能觸動我們內心的深遠思考——按葉兆言的話說：「文學就是立體而複雜的，就是深不可測的。」



### 顧文豪

## 以讀書人眼光做實事

對顧文豪的初始印象源於聽過的一個對他外形之形容——少年陳丹青。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頓時為我勾勒出了一個知性而侃侃的年少書生形象。他從海上來，復旦大學高材生，在學校就以善於對中國文化展開思辨而聞名。而見到他本人之後，則覺其形貌十分貼切於他為本土一閣副刊所撰寫的專欄名：「在民國」。不是說外形上扮民國范那種，而是氣與神；人是清瘦的，談吐時講到興起，眼神裡會閃過帶點執拗的亮光，少年氣盛，卻有着博覽群書過程中沉澱下的一份含蓄。這樣一個人物，或許正如他自己所界定的那個自我：是個「讀書人」。

按顧文豪的話說，「讀書人」是老百姓的價值觀。他喜歡這個標籤。他說中國內地讀書人多，做書人少，就以香港書展為例，這樣的活動其實讀書人也根本辦不下來。因而「讀書人就該做讀書人做的事情，否則？是要出問題的。」

但讀書人到底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做些實質事情。他心念及此，便讀起香港書展的好。「至少主辦方願傾聽一班文化人的意見。」相比起來，內地就散亂得很。他曾參加過某報紙的建設會議，聽到人稱這份報紙是辦給知識分子的，頓生質疑：「那麼要面對的究竟是哪一類知識分子？」類似的所謂文化推廣活動大同小異，只有可說性，見不到可行性，更充斥奇異論斷。這樣的大環境之下，他更清醒於自己想做什麼——「愛默生說文化是有潛能的，我想找到一種對接的途徑。」

### 「港台風」的誤會

內地的「港台風」近年愈演愈烈，一系列港台作者的名字藉助媒體、作品、電視訪談，成為內地讀者的寵兒。但顧文豪卻冷靜解讀這一現象，他以自己的個人閱讀經驗而言，認為這種對港台文學的追捧中蘊藏了一些誤會。他坦言內地讀者其實只是對港台作者「有選擇性地」接受。「我們所接受的香港意見或說香港視野，是像梁文道、馬家輝等更接近我們審美習慣的作者，而其實真正香港本土的代表，像西西、董啟章等人，並未融入內地讀者主流閱讀中。」至於台灣的張大春、朱天文等人，在他看來則應被放置進更接近偏美學觀念、具傳統意味的華文序列之中，而非偏港台性。

「比如你隨便找一個大學中教現當代中國文學的教授，讓他講出5個港台作家的名字，他未必說得出。」顧文豪認為這恰恰反映出了內地與港台美學觀念的差異。因而港台文學在大陸大受歡迎？「這完全是誤會。」港台文學的確衝擊着主流場域內的文學觀念，但必須承認內地讀者是不習慣的。「為甚麼我們讀董啟章或是略以軍時，覺得讀不下去？」這背後根本是兩種價值觀的呈現。他指出：「香港其實是個很中國的地方，近似於清朝，政府公函中都會使用台端的稱謂」但大陸則沿襲了文化思想高度統一的傳統。



來香港書展見到這裡的文化群落，顧文豪反觀內地經驗：「北京也有圈子，不過是利益共同體。」而港台的媒體性寫作氾濫，在他看來則是極好的事。他笑言：「香港是知識分子寫專欄，我們是寫專欄的人變成知識分子。」這揭示出了內地文化生態的疲軟匱乏——「一件事情的技術性操作，怎樣是對的？知識分子卻都搞不清。」最簡單的例子是超女選拔，一人一票，竟被不少評論人稱為民主，荒唐得缺乏常識。「民主是甚麼？一人一票最基本的呀。」顧文豪指出這是全方位匱乏，且是長期匱乏所導致。

### 民國百年與公共知識分子

顧文豪受邀來港演講的講題是解讀中國閱讀界的三個關鍵詞，但逐一審視，其實可以被稱之為三個誤會。「港台風」的誤會澄清之後，還有「民國百年」與「公共知識分子」的誤會。

今年既為辛亥百年，一眾民國題材的作品、影視、文章自然被拿出來重讀熱炒，大家起興得很，可對這位「在民國」的聰慧讀書人而言，又一眼看出其中的破綻。顧文豪表示，首先大家要搞清楚，辛亥百年和民國百年根本是兩回事。「辛亥百年，是國共兩黨的歷史都能放進去自我代入。」但民國百年是什麼？「群龍無首」。在中國這個最需要最期盼大師的社會之中，民國恰恰只盛產了魯迅等一班小師。顧文豪說：「中國需要言論界大師，其實反映出了人們需要主權的聲音，需要一種規律，一種基調。」換言之，是民眾期待被統一思想的變態反應。

那麼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時髦話題也就應運而出。顧文豪調侃道：「可是公共知識分子，要有知識呀。」他直言不諱指出，內地連公共空間都寥寥，因而高產的是媒體知識分子，談不上公共。「概念不能混淆。」按他的話說，在內地做專家太容易，「凡事只要不給出一個確定性結論，自然是專家。有知識的人卻不給民眾明確的知識。」這是因為人們將知識分子視為他們的發言人，「不能背負之重啊，這根本是清官式思維。」言及此，他眼裡開始發亮，「公共知識分子要站在真理那邊，可我們的公知，很快就被民眾異化為炮筒。」背後沉默的才是大多數，他稱之為：「無聲的中國換來有聲的渠道。」

那麼可以如何？顧文豪心知肚明，在哪裡做文化人都是困難的，但不論市場需求多少，都有其價值在其中。他誠懇道出自己內核中的善意祈願：「我希望大家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些人。」年紀雖輕，做書評的日子卻已不短，他說他在意的是告訴讀者讀一本書可以有幾條路，提供給讀者以新的角度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話語真的單一，動不動就出一個流行語，這說明我們不得不用最低成本去溝通。」找不到更多方式，何其可悲，那麼總歸需要清醒者來啟引路人，要讓文化往下去，要讓它有趣。

「我們不必不動不動就要發現自己，好像人人都要變成柏拉圖。」顧文豪覺得這樣做文化很可怕，「難道要13億人裡10億都讀管錐篇？」其實各取所需才是好的。他認為文化最終仍直接體現在行為方式上，而知識的傳承不代表文化的傳承，更不代表價值觀，惟望內地的文化人能夠更加開放，文化氛圍亦將隨之變得可觀與多元。唯望，唯望。